

# 浅谈青铜器铭文的装饰功能

杨 远 ( 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摘要: 商周青铜器的铭文具有重要的书史性质, 从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组成元素看, 它也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而青铜器铭文的这种装饰功能, 也有连续的发展过程: 其滥觞于史前的刻画符号, 在商、西周时期得到初步的发展, 到东周时期达于繁盛, 东周以后逐渐装饰于玉器、铜镜、瓷器等其它器物上, 成为我国古代装饰艺术的一道独特风景。

关键词: 青铜器; 图形文字; 铭文; 装饰

中图分类号: K87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2-0036-04

青铜器在过去, 最为学术界关注的内容就是其上的铭文, 因为它有重要的“书史”性质, 为古文字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学者们也大多热衷于对这些特殊文字的考释, 毋庸置疑, 这些文字确实为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并且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谈到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些文字, 尤其是一些器物表面的铭文, 除了它本身的纪念“书史”性质外, 它也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青铜器铭文的装饰性, 学者们也早有认识, 如郭沫若先生在谈及栾书缶铭文时指出“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 其效用与花纹同。”<sup>[1]</sup>唐兰先生也曾提出: “把铭刻作为图案或夹在图案中间, 或写成带图案意味的鸟虫书及其它形体, 以及嵌金银, 嵌绿松石, 也都为的是美观的目的。”<sup>[2]</sup>但均未引起足够重视, 对其研究有待深入, 下面就青铜器铭文装饰的滥觞和在商周时期的发展概况做以简要的系统分析, 权作抛砖引玉。

## 一、铭文装饰功能的滥觞——史前的刻划符号

这种铭文(或刻符)性装饰, 是在继承史前陶器的刻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杨晓能先生近年也提出: “(商周青铜器上的) 有些图像既可作为图形文字又可作为铜器

装饰, 继承了史前传统。”<sup>[3]</sup>过去学者多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史前陶器的刻符做了系统分析研究, 我们认为史前陶器刻符同样具有美化陶器的作用, 也就是具有装饰性。下面我们就对史前陶器刻符装饰的发展作以简要回顾。

就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显示, 陶器刻符最早见于距今 8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图 1-1), 但它在陶器上的大量出现要到仰韶文化时期。目前在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铜川李家沟、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汝州洪山庙等遗址均发现有陶器刻符数十种, 特别是在宝鸡北首岭还发现有用黑色彩绘的符号。它们大多刻划在钵形器外口缘的黑宽带纹或倒三角纹上, 一般一器刻一个符号, 这些符号以简单的线条排列穿插组合而成。就其性质, 一般认为它们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记事标志<sup>[4]</sup>, 但从其所在位置看, 在客观上也对器物具有装饰作用(图 1-2)。在时代稍晚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 发现有类似于仰韶文化的刻符, 但它们多以颜料描绘而成。这些符号有的处于器物的下腹,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下腹多无纹饰, 这些描绘的符号调节了这种素面的单调感, 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装饰作用; 有的符号穿插描绘于彩绘纹样中间, 既充实了纹样的空白, 也改变了纹样的组合形式, 无疑和纹样一样, 具有装饰的作用(图 1-3)。约略



图1 史前时期陶器上的刻符装饰

同时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则发现了许多图像类符号，它们大多刻画或描绘于器物的腹部，这些符号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因而它们更具有图形的特征，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装饰意味（图1-4）。到龙山文化时期，这种符号性装饰仍习见于陶器表面，特别是到龙山文化的末期，这种刻画符号更具有了文字的特征，它刻画于陶器表面，是毫无争议的文字性装饰。如陶寺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朱书陶文，绘于器物的表面，装饰效果和意图非常明显（图1-6）。而在南方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诸多文化圈内都发现有类似的刻画符号，许多符号轮廓分明、具有图形的特征，虽可能具有徽识的作用，但其图案装饰意味则更浓（图1-5）。

史前的人们不仅充分利用艺术形式来表达宗教文化上的观念，他们也十分重视表现艺术的和谐美。彩陶盆中对称的人面鱼纹和网纹若仅有黑彩的圆形格局，画面自然有些平庸呆滞，所以原始艺术家便在黑边上或空白处匀称地刻画出具有神秘意义的符号，打破了先前静止的格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史前继承并沿用下来的这种刻于陶器表面的符号或“文字”，在商周以后仍有发现，它们可能有其它的意义，但其装饰性也非常明显，起到了美化器物的作用（图2）。这种文字的装饰作用，逐渐为古代艺术家所继承发展，用于装饰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如后代（包括现代）日常使用的瓷器上常见的吉祥用语——“四季平安”、“吉祥如意”等，既起到了美好的祝福作用，也同时装饰了器物，使器物更为美观。其中，在青铜器上

使用文字性装饰，在商周时期最为发达，由最初的一字到多字，由散乱到整齐划一，由图形文字到错金铭文、鸟虫书，充分展示了这种装饰的繁华富丽丝毫不逊于青铜器上的线性纹样和雕塑性装饰。下面就其发展情况分阶段作以分析如下。

## 二、商代、西周青铜器铭文装饰的初步发展

在青铜器上使用这种文字性装饰，就目前资料显示，最早见于商代前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发现较少，且有铭者也很简短，一般为一两个字，多被认为是族徽。这些铭文，多数图画性很强，是在继承陶器刻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图形文字。有的刻于器物显著位置，起到了装饰器物的作用。如郑州商城白家庄墓地出土的一件罍（C8M2:1）<sup>[5]</sup>，其颈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唐兰先生释为“龟”字，并认为是族徽<sup>[6]</sup>。从这三个龟形图案匀称分布的特点和其图形特征看，显然具有强烈地装饰效果，它们所在的罍的颈部光素无纹，用三个龟形图案作以调节，或可作徽记，但装饰意图非常明显。另外，在郑州杨庄出土的一件爵<sup>[7]</sup>，腹的一侧饰兽面纹，另一侧饰以鑿为中轴的对称双目（图3-1），有人认为应为象形文字，释为“𠂔”<sup>[8]</sup>，考虑到郑州商城陶器上曾出有相似的刻符（图2-2），如果前者为文字，那这种推断也不无道理。从其所在的位置和图形特征看，其装饰意图也很明显。其它商代前期青铜器的铭文多铸于器物内壁部位，有的较为隐蔽，有的也较明显，但是否有装饰意图尚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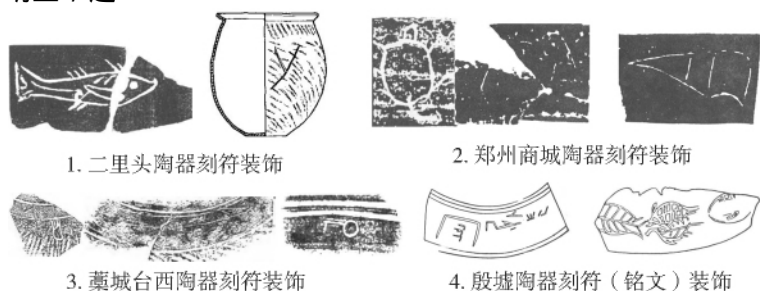


图2 夏商时期陶器上的刻符装饰

肯定。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铭文由少逐渐增多,少者一、二字,多者四、五字到数十字不等,内容主要是族徽、职官名、器主私名、祭祀对象身份和庙号等。这些铭文大多刻于器物较为隐蔽的地方,如爵、斚的鋈阴,觚、尊的外底,鼎的内壁,盂、卣的盖、底等,都是需加细心才能看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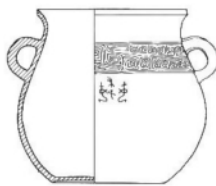
这些铭文的形体均有美术加工的痕迹,有时还采用变形、增饰对称的形式,既有原始的象形特征,又有别于实用文字,有浓厚的美化装饰意味,所以有学者称之为“象形装饰文字”<sup>[9]</sup>。而部分器物的铭文刻于非常明显的部位,如器物的肩、腹的外部,我们认为这种铭文具有明显的装饰目的。最为显著的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器物:妇好罐和平底盃<sup>[10]</sup>。妇好罐(M5:852)的腹外壁中部有“妇好”二字铭文,与铭文之上装饰的一周斜角雷纹相对应,构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图3-2)。圆肩平底盃(M5:837)的“妇好”铭文,位于器物一侧的肩部,位置十分醒目,和筒状短流上的斜角雷纹相呼应,自然协调,装饰意图极为明显(图3-3)。“它与简洁的轮廓线配合协调而统一,整个造型干净利落。”<sup>[11]</sup>陈志达在探讨妇好墓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时,特别指出“少数铜器的铭文却铸在壁面显露部位,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sup>[12]</sup>

另外,这个时期的一些铭文仍具有图形文字的性质,也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岗HPKM1004大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sup>[13]</sup>,底里分别铸有牛形、鹿形的铭文,而它们的腹外壁则分别以牛首、鹿首为主纹作装饰(图3-4),这种内外呼应的装饰形式极具艺术巧思,或暗示了这类器物的用途,但装饰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字数逐渐增多。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先扬祖等,其史料价值非常重要,正如郭沫若所讲:“在其进化的第二阶段有书史的性质,此性质以西周遗器为最著。”<sup>[14]</sup>这些铭文虽也大多刻于器物内壁或底部,但因多长篇巨制,并不是很隐蔽、不易发现,铭文虽长,但多注意谋篇布局,加上铭文本身的书法艺术美,对器物光洁素朴的



1. 郑州杨庄出土爵



2. 殷墟 M5:852



3. 殷墟 M5:837



4. 殷 HPKM1004

图3 商代铜器铭文(图形文字)装饰

内壁也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如史墙盘的铭文<sup>[15]</sup>,刻于盘内腹底部,共18行284字,几乎占去了底部所有面积,而且铭文布局严谨,笔画粗细均匀,首尾如一,字体端庄,笔势柔和圆润,极富装饰意味(图4-1)。同样,这种铭文的装饰作用,也用于部分器物的外壁十分醒目的位置,装饰意图更为明确。如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十三年壶<sup>[16]</sup>,器口外壁用11行铭文作点缀装饰,改变了器口外常用纹样(环带纹)装饰的单调感,同时又与颈部的鸟纹和腹部简洁的十字络纹相呼应,使整个器物装饰极为简洁流畅、和谐统一(图4-2)。

### 三、东周青铜器铭文装饰的繁荣

到了东周时期,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早期的铭文与西周晚期铭文很相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各地文化的迅速发展,影响到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出现了带有地域色彩的青铜铭文,如北方晋国尖头肥腹的蝌蚪文,南方吴、越、蔡、楚等地出现了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圆点作为附加装饰的鸟虫书体。这时期铭文的装饰意图则更为突出,艺术设计者采用了多种形式来加强铭文的装饰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青铜器的铭文刻于器外者显著增多,强



1. 76FZH1:5



2. 76FZH1:21

图4 西周时期铜器铭文的装饰性

调装饰作用。郭宝钧先生也曾作过总结“凡这些铭文一般都在器壁外,为人目能见,人手能接触到的地方。”<sup>[17]</sup>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这种于器物外壁刻铭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所占比例比以前有所增多,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如江苏吴县何山出土的春秋后期的一件盃<sup>[18]</sup>、山西文水上贤村出土的壶<sup>[19]</sup>、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汤鼎和鬯<sup>[20]</sup>、湖北随州出土的壶<sup>[21]</sup>等,它们的铭文或刻于颈部,或刻于肩部,均十分醒目,特别是战国时期的许多器物多素朴无纹,这种铭文起到了强烈的装饰效果。李先登先生就曾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许多铭文已成为器物表面装饰的一部分。此时美术字体也兴起了,例如南方吴、越、徐、楚地区流行的鸟虫书即在文字笔画上附加鸟形装饰,或整体作鸟形,更增强了铭文的装饰效果。”<sup>[22]</sup>

二是设计者通过对书体的象形变化增加装饰效果,如圆转流畅的篆书体和前述蝌蚪文、鸟书、龙书、虫书等图形文字的变化,追求图案化的装饰目的极为明显,使青铜器的装饰内容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如鸟虫书中的象形虫纹、鸟纹、龙纹加夹在字体结构中,在不同的分布区域,它们的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它们可以是单鸟或双鸟、多鸟来装饰一个字,并附加于字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鸟形处理可以是双钩式或剪影式,有一定的线条粗细和节奏的变化。鸟形不光注重鸟头的刻画,而且在字体必要处可以加上鸟爪等来装饰,还有的鸟虫书运用整体的鸟形来装饰描绘,正是这种千姿百态的鸟虫书造形,使青铜器的铭文装饰变幻多姿、丰富多彩。

三是在铭文上加以错金、银,这类铭文大都在器物的显著位置,起到了明显的装饰作用。如山西文水上贤村出土的壶,其肩部篆书错银铭文9字,外部边框也用错银镶边,和素朴无纹的壶体形成了强烈反差,更加突出了铭文的装饰效果;而传世的栳书缶的肩部和腹部则有错金铭文5行40字,在错金书中极为少见,其字体多变、金丝圆转所表现出的优美韵致使青铜器的铭文装饰达到了新的境界。

#### 四、结语

由上述可见,青铜器上的铭文装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始自商代前期,历经商代后期、

西周、春秋早期的发展,到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达于繁盛,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器表的雕刻主题和纹样,这些铭文同样刻意求功,字里行间洋溢着书者对文字艺术化的执著追求。商周以后,这种文字艺术的装饰功能继续被运用于铜镜、瓷器等器物的装饰上面,形成了我国古代装饰艺术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释:

[1] 郭沫若 《青铜时代》第317、31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2] 唐兰 《铜器》,《文物》1952年4期。

[3] 杨晓能 《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文物》2005年6期。

[4] 王蕴智 《字学论集》第9页,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5]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6] 唐兰 《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7] 《河南出土西周青铜器》编辑组 《河南出土西周青铜器》图六〇,文物出版社1981年。

[8] 曹淑琴 《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

[9] 丛文俊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13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张孝光 《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殷墟青铜器》第11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2] 陈志达 《妇好墓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中国青铜器全集》2,文物出版社1997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78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4] 郭沫若 《青铜时代》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15]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16]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17] 郭宝钧 《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6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8]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年第5期。

[19] 胡振祺 《山西文水县上贤村发现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6期。

[2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绍兴306号战国墓》,《文物》1984年第1期。

[21] 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市发现秦国铜器》,《文物》1986年第4期。

[22] 李先登 《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第1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